

京官名宦与惠州
10

惠州知识精英 投笔从戎 献身革命

作者 / 徐志达 吴定球 何志成

投笔从戎，以优异成绩考入军校学军事，成为一名有近代思想的新式军人，在风云变幻的革命大潮中为富国强兵书写自己的精彩人生。这样的际遇，在清末民初的惠州，是一个群体性社会现象。

叶挺所著的《囚歌》，正是叶挺、郑士良、邓铿、廖仲恺、邓演达等惠州英烈文化性格的形象写照，是对自明代王度以来惠州士子以身许国人文传统的近代诠释。他们为崇高的理想献出了宝贵生命，也给后人的前进作出了精神指引。他们是惠州的骄傲，也是惠州的人格楷模！

壹 邓仲元积极支持孙中山革命

据祝基棠、黄松森主编的《惠州名人》一书记述（附表），清末民初惠州军事类名人不下数十位，他们中，赴日本留学深造，期间加入同盟会的惠州人有叶匡、黄公柱、林振雄、钟鼎基等。他们回国后大都参加了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，成为晚清民初革命大潮中叱咤风云的人物。

在国内出身军校而成为耀眼光将星的也不少，特别是邓仲元和叶挺。

邓仲元，原名士元，又名铿，原籍梅县，七岁随父经商移居淡水。邓铿早年就读惠州学堂，肄业于淡水崇雅学堂，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考入广州将弁学堂。当时清政府推行“新政”，意欲重整军事，建立新军，效仿德国、日本建办陆军学堂，培养军事人才，在广州黄埔新洲平岗原预备学堂旧址开办广东陆军小学堂。24岁的邓仲元被委任为该学堂学长。

贰 邓演达邓演存兄弟投笔从戎

在邓仲元的感召、西方开明思想的启蒙引导下，邓演存、邓演达这对兄弟也踏上了为改变中国命运而奋斗的人生道路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。

惠州淡水濒临南海毗邻港澳，是当时对外通商交往的口岸，欧风美雨纷纷由此登陆。当时，归善县永湖乡的秀才邓镜人崇尚西学，所创鹿冈学校（1986年更名为演达学校）的春联就是“培植资时雨，英雄起草茅”。

他秉承教育开启民智的宗旨，要让新学的及时雨在平民草莽中培育时代英雄。为此，他把大儿子邓昌明改名为邓演存，字竞生；第四子邓达明改名为邓演达，字择生，教育他们要追赶时代的潮流，奋发图强，报效国家。

光绪三十年（1904年），邓镜人把大儿子邓演存送到刚刚创办的广东黄埔陆军小学堂读书，成为该校首期学生。光绪三十三年（1908年），他又把二儿子邓演达送到同一间学堂。

邓演存于北京陆军大学毕业后投身军旅，1925年参加北伐，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

长，授少将军衔。陈铭枢、张发奎、叶挺等名将当时均属其部下。后任汉阳、石井等兵工厂厂长。他一生从事武器技术研究工作，建树良多，为我国有名的武器专家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邓演存被聘为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。

邓演达15岁进入广东陆军小学堂读书，1911年即在父亲挚友邓仲元的介绍下，与陈济棠、李仙根等同学秘密参加同盟会，先后就读于陆军速成中学、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，接受了系统的军事教育。

1920年应邓仲元之召参加粤军，战功卓著，被孙中山提拔为少将参军，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，创办黄埔军校，并任训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教育长等职。北伐时期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，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。大革命失败后，曾远赴欧亚多国考察，归国创建中国农工民主党。1931年由于叛徒出卖被蒋介石逮捕并秘密杀害，年仅36岁。

叁 叶挺等志士英年早逝令人叹惋

叶挺，字希夷，广东归善（今属惠阳区）秋长周田村人。他七岁时入本村腾云小学读书，老师陈敬如思想进步，常向学生讲解中国贫弱饱受列强欺凌的历史，使叶挺自幼就萌发了救国救民的志向。清宣统二年（1910年），惠州府借在西湖永福寺开办蚕桑学堂，旨在培养兴办实业所需之中等专业人

才，是一所官办的乙种实业学堂。叶挺考入该校读书。

当时正是辛亥革命前夜，同盟会在惠州宣传“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”的政治主张，号召人们剪掉辮子推翻满清。叶挺满腔热血，当场剪去自己的辮子，因此被官府怀疑为革命党人而被捕入狱，后经校长出面始获保释。此后不久，叶挺转入黄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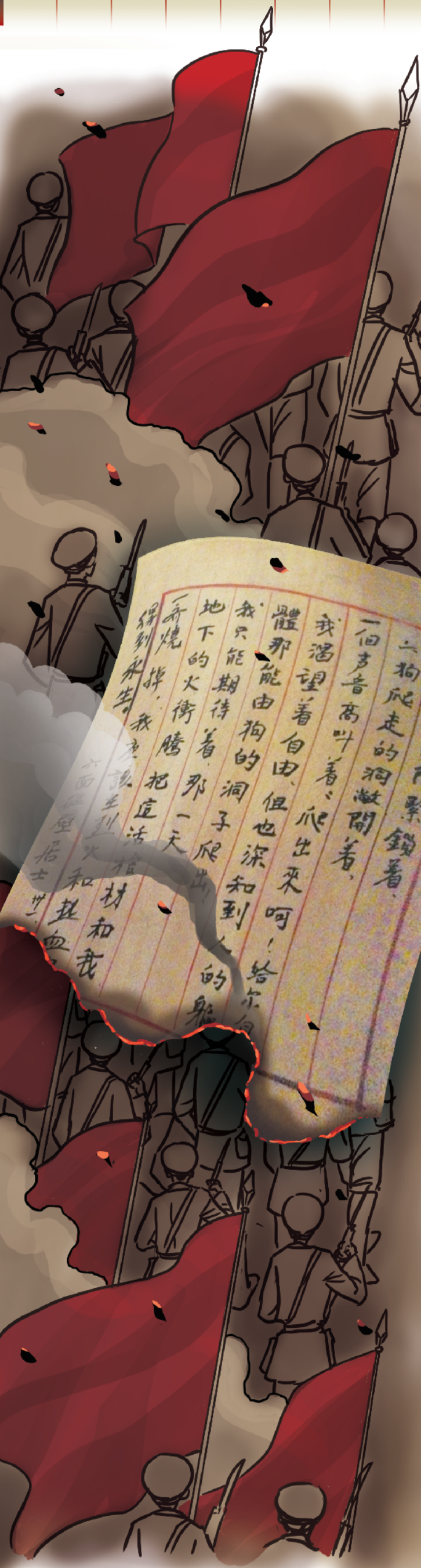


插图 / 杜卉

陆军小学堂学习军事，从此开始了充满传奇的革命生涯，由北伐名将到新四军军长，成为我国现代著名的军事家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。

1946年3月7日，叶挺由重庆返回延安途中，因飞机失事遇难。将星陨落，万民同悼。聂荣臻与叶挺是老同学老战友，他以160字长联哀挽叶

挺，概括了叶挺的光辉人生，也叙述了他们间的深厚情谊。

自清末至民国，为革命献出生命的惠州人不少，郑士良、邓仲元、廖仲恺、邓演达、叶挺……他们都是民族的精英、国家的栋梁，其英年猝亡，壮志未酬，令人叹惋！正如叶挺在《囚歌》中写的那样，为了革命，他们在“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”！

清末民初 惠州军事名人录

姓名	县籍	初年学历	主要事迹
陈炯明	海丰	光緒二十四年秀才，广东政法学堂	清咨询局议员，同盟会员，光复惠州、省都督、粤军总司令陆军总长。
邓仲元 ^{（铿）}	惠阳淡水	淡水崇雅学堂，广州将弁学堂	参加光复惠州之战。国民党内多次任高级军职，遇刺身亡后追赠上將。
林成登	惠州城区	虎门武备学堂	初任清军虎门要塞守备，后参与孙中山反袁运动，为中将高参。
翁式亮	惠东多祝	广东陆军速成学堂毕业	参加光复惠州之战。后任循军团长、都督府陆军参谋。
叶 举	惠州府城	毕业于将弁学堂	初任广东陆军第三混成协参谋长，第三旅旅长，后加入陈炯明粤军。
丘耀西	惠州冷水坑	惠州府中学堂	1911年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和光复惠州之战，后加入粤军。
骆凤翔	惠州江北新村	惠州府中学堂、广东陆军速成学堂	曾参加同盟会，分别在陈炯明、孙中山部任军职，1949年起义归来。
钟鼎基	惠阳水口	广东陆军武备、北洋陆军速成学堂	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，参加光复惠州之战。北洋政府授其惠威将军。
谭建基	惠阳	黄埔陆军速成学校、日本步兵学校	1920年任援闽粤军参谋官，抗战后荒废，新中国成立后重修。2011年前后，为了配合莞惠城轨西湖站施工，荔浦清风公园被拆建，老仲元亭的砖瓦被拆下保存在惠州博物馆。2018年，仲元亭与纪邓山庄终于在新设立的荔浦清风公园中得以恢复。
叶 匡	惠州	肄业惠州小学堂留日本学习海军	在日本参加同盟会，参加光复上海之战，1916年起兵惠州，病卒。
严蔚文	惠阳水口	岭南军事将官班	曾任国民革命军东江指挥所主任，第六路军总部副官处长，少将衔。
尹 骥	惠州府城	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日本步兵学校	学成回国追随陈炯明，随叶举炮打总统府，抗战后在漳州病逝。
黄公柱	惠州府城	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	在日本参加同盟会，参加武昌起义，任汉阳兵工厂厂长，官至中将衔。
林振雄	惠州县城	虎门讲武学校，保定军官学校	1910年往日本士官学校深造，加入同盟会，回国多次担任军事要职。
吴 涵	惠阳	日本陆军步兵学校、炮兵学校	回国任国民革命军师、军参谋，1945年授陆军中尉衔，1946年退役。
邓演存	惠州永湖	北京陆军大学	1926年参加北伐，曾任汉阳、石井等兵工厂厂长，一生从事武器研究。
黄植楠	惠州府城	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	曾任国民革命军少将副师长，1936年赴德国习军事，抗战时领中尉衔。
谢婴白	博罗仍图	南京陆军中学、保定军校炮兵科	入日本早稻田谈政治经济，回国参加北伐，领中尉衔，国大代表。
青 主	惠州府城	黄埔陆军小学堂	1912年留德法学博士，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少将主任。
徐启明	惠阳淡水	武昌陆军中学、保定军官学校	跟随李宗仁。抗战参加淞沪、徐州会战，李宗仁北伐行轅中将参谋长。
何友逊	惠东平山	广东陆军学校	早年加入同盟会，后加入共产党随周恩来东征。
叶敏予	惠阳	北平陆军大学	长期任国民党军职，1943年任第七战区惠澳守备指挥官，司令部高参。少将。
邓演达	惠州陈江	广东陆军速成中学、保定军官学校	1920年任粤军连长。拥护孙中山，任黄埔军校教育长，后被蒋氏杀害。
罗伟疆	惠州陈江	广东政法学校，虎门陆军速成学堂	1911年加入同盟会，先后任国民党惠阳县、农会主任、工人部长。
李崇纲	惠州城区	黄埔陆军小学、武昌陆军预备学校	长期任国民党军职，与李扬敬、李煦寰重建百花洲落霞榭和野史亭。
叶 挺	惠阳秋长	黄埔陆军小学，保定军官学校	1926年率独立团参加北伐，为北伐名将。参加南昌起义。新四军军长。
李煦寰	惠州县城	湖北陆军学校，北洋军医大学	留学法国，获药理学博士学位，1928年弃医从军，官宦治部中将主任。
邓 挥	惠阳淡水	保定陆军军官学校，黄埔军校	邓仲元弟。历任黄埔军校炮兵大队长，国民革命军团、师长领少将衔。
邓士章	惠阳淡水	黄埔陆军小学，上海同济大学	留学德国柏林工业大学。回国任兵工厂工程师，长期任兵工厂要职。

制表 / 杜卉

学者建议
文／图 羊城晚报记者 吴大海 实习生 郭妍欣

西湖打造“双亭”景观 再现“二邓”革命情谊

一个是“百将之将”，一个是“粤军灵魂”，清末民初的邓仲元和邓演达两位志士，承载着不少惠州人的革命情怀。记者近日走访发现，位于西湖周边的仲元亭、演达亭等多座关于“二邓”的纪念建筑藏匿于重重树影，不为人知。专家建议将西湖“双亭”打包修缮，重叙“二邓”革命情谊。

邓仲元事迹鲜有人了解

踏入西湖荔浦清风公园侧门，前行数步，仲元亭便映入眼帘。此亭亭面覆以绿色玻璃瓦，飞檐微翘，内外各有六条红色圆柱；亭前筑有三曲小桥，与湖边小道相接，不远处的纪邓山庄正门高悬红底金字牌匾，山庄外“仲元颂”爱国主义题材浮雕景观气势恢宏。

立秋的早晨，从纪邓山庄穿行而过的行人并不少，却很少人为其驻足。从惠东远道而来的张先生坦言，自己一大早带女儿来西湖游览，一路走马观花，完全没注意浮雕景墙上的人像究竟是谁。不只是游客，住在附近的市民李先生也深有同感：“每次路过仲元亭都会好奇仲元到底是谁。”

“确实如此，游客不太了解邓仲元，甚至以为纪邓山庄纪念的是邓演达。”纪邓山庄相关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，仲元亭始建于1930年，抗战后荒废，新中国成立后重修。2011年前后，为了配合莞惠城轨西湖站施工，荔浦清风公园被拆建，老仲元亭的砖瓦被拆下保存在惠州博物馆。2018年，仲元亭与纪邓山庄终于在新设立的荔浦清风公园中得以恢复。

记者走访发现，如今纪邓山庄被设置为惠州西湖风景区游客服务中心，供游客休息、咨询。工作人员回应，他们也正计划将游客服务中心迁往他处，在纪邓山庄设置邓仲元史料陈列室。未来，市民有望能在这里通过图文展示、影视短片播放、史料讲解等方式，了解邓仲元革命事迹。

演达亭与铜像隐匿树影中

与邓仲元同宗的族人邓演达也在西湖附近拥有一座纪念馆，此事也渐渐被人遗忘。日头正盛，靠近居民区的西湖西苑并不缺少来往行人，他们脚步匆匆，鲜少踏足西苑门右手处的小树林。几棵古树郁郁葱葱，投下一大片树影，高大的邓演达铜像安静伫立着。记者从铜像后的奠基石边走过，才看见那座被垂下的树枝遮住大半个身子的演达亭。

“邓演达是三栋镇的英雄！”住在附近的市民刘女士说，演达亭破旧、名不见经传，所以游客稀少。然而亭内阴凉，倒是经常有人来此乘凉、午睡。

从小在西苑附近长大的保安何生回忆，邓演达铜像和演达亭修建之初，不少仰慕邓演达的惠州人专程前来拜谒，热闹非凡。三栋镇邓演达纪念馆建成后，西湖的铜像和演达亭才逐渐没落，少人关注，到访的游客都要靠询问保安才能找到具体位置。

“建设邓演达铜像，是为了避免和三栋的纪念馆内容重复。”广东省民俗文化研究会理事、惠州民俗学者林慧文感慨，邓演达铜像和纪念亭落成，是当年不少专家奔走呼吁的结果。其存在既能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，又是城市人文风景建设，意义很大。

专家建议讲好“双邓”故事

邓仲元与邓演达同宗、同乡的缘分让他们相识相知。年长9岁的邓仲元提携后进，是邓演达革命路上的引路人。不少专家认为，比起邓演达，邓仲元对惠州的影响长久以来都被轻视了，建议有关部门加大宣传力度，讲好邓仲元事迹与“双邓”故事。

“每次参观纪邓山庄，都没机会看到邓仲元相关的展览。”惠州博物馆原馆长王宏宇感慨，当时邓仲元在惠州发起革命，鼓动了不少人能志士加入革命队伍，深受老一辈惠州人的爱戴。“民国时期的惠州涌现了不少将军，他们受邓仲元影响很大。今天的惠州人‘只知邓演达，不知邓仲元’，实在让人遗憾。”

王宏宇建议，应在仲元亭入口处做一个显眼、详细的邓仲元介绍牌，并利用纪邓山庄这一载体，举办一系列展览活动，把邓仲元事迹讲好、讲清楚。

“邓仲元祖籍梅州，其成长的根却在惠州，是个不折不扣的惠州人！”同为梅州籍惠州人的林慧文表示，邓仲元被称为“百将之将”，深受各党派派的认可，对惠州的影响不亚于邓演达，却因出身梅州一直得不到惠州人重视。他认为，应该正视邓仲元的惠州人身份，在荔浦清风公园立仲元塑像和千字石碑，传播邓仲元事迹，增强惠州人的认同感和自豪感。

“惠州关于邓演达的研究做得够多了，但他与同乡邓仲元之间的革命故事很少人涉足，这其实算得上一大特色。”惠州学院政法学院历史系主任、副教授包国滔表示，西湖西苑的邓演达铜像及纪念亭规模小，无法与三栋邓演达纪念馆相提并论，不如将演达亭跟仲元亭联系起来，做好“二邓双亭”文章。

林慧文对此表示赞同，他建议在演达亭附近撰写双邓相关碑文、建立小型纪念馆，同时将它们与距西湖不远的飞鹅岭打包开发，充实这一带的革命历史资源，吸引更多游客前来参观。



重建后的仲元亭焕然一新

演达亭掩映于树后

晚清兵制之变与近代军阀割据

羊城晚报记者 夏杨

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，当清王朝惊魂未定之时，太平天国运动又爆发了，并在短短几年内席卷中国南方，控制了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富庶之地，成了清廷的心腹大患。

更令清廷心焦的是，紧急派往前线“救火”的八旗、绿营兵一触即溃。太平军占据南京后又发兵北伐、西征，清政府根基动摇，几乎已命悬一线。

性命攸关之际，清廷还能出什么牌？我们盘点一下，大概有这么几张：一是继续调集八旗绿营兵死磕。这很可能挡不住，最终导致政权崩塌，吓破胆的清廷

对此也没信心。

其二，清廷摇尾乞怜，请求外国势力援手干涉。这种可能性是有的，但意味着进一步丧权辱国。当时刚登基、尚有“雄心”的咸丰帝并不想如此。

还有第三张牌，就是依靠清廷尚存的可怜的威望，从地方挖掘潜力对抗太平军。这种情况下，至少还能维持统治。不过这意味着要变革祖宗之法，赋权给汉臣带兵。从当时看来，这种办法或能解燃眉之急，且清廷损失较小。

于是咸丰帝下旨，让正在老家丁忧的在籍侍郎曾国藩就地募兵、练兵。

这就是曾国藩创建湘军的背景。只能说，这是清廷的一种无奈选择。让一个文人去练兵，能否成气候，清廷上下也没多大信心。

然而没想到，12年后曾国藩真的攻下了南京，一度所向披靡的太平军被其击败。

湘军为何有这么强的战斗力？这要从兵制变革中找原因。满清能崛起于东北，得力于八旗兵制。入关后又建立了绿营兵。

八旗、绿营都是国家正规军，实行世袭兵制，军户家庭收入靠俸饷。起初这种“专业”兵很有战斗力，但承平日久，养尊处优，当

兵只为吃俸饷；机制腐朽，连老小孩都列入兵籍。且八旗绿营兵将分离，战时临时拼凑的军队结构松散，战力很弱。

而曾国藩编练湘军是另起炉灶，用的是勇营兵制。勇营原为地方团练，曾国藩对其开展正规训练。湘军实行募兵制，大帅招选得力将领，将领招选合格士兵。将帅士兵之间联系紧密，打仗时相互照应、拼力合作，战斗力很强。

万物皆有两面。湘军如一把尖刀插向太平军，除掉了清廷的心腹大患。但同时其另一面也慢慢暴露。这一点咸丰帝早有担忧，

怕其成了双刃剑。“天京事变”之际，咸丰曾想弃用曾国藩，让他回家继续丁忧。但局面很快变了，洪秀全启用陈玉成、李秀成等年轻将领，实力再次高涨。

无奈的咸丰帝不得不弃用曾国藩，并将一直不愿放手的部分地方财权和行政权一并给了他。当上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大权在握，湘军战力也大大增加。

放权易收权难，对虚弱的清廷更是如此。尽管曾国藩是个理学家，有强烈的自律意识，在剿灭太平军后主动消减了湘军力量。但清廷统治再想回到太平天国运动前，已经不可能了。

随着战功积累，湘军将领成了晚清最大的一支军事政治力量，汉人力量崛起动摇了满清的统治基础。在湘军之后兴起的李鸿章的淮军，以及后来全国各地组建的练军、防军，皆大致模仿湘军，控制权掌握在地方督抚之手，中央皇权被严重削弱。

清廷大权旁落，有个典型事件，就是“东南互保”。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，慈禧太后仓皇西逃，而东南诸省不着急“勤王”，而是跳过中央与外国签协议，谋求地方自保，清廷颜面扫地。

甲午战败后，袁世凯在天津

小站练兵，用的是现代兵制，但士兵和将帅间一如湘军，存在依附关系。招募、发饷等操于将帅之手，军队归属感很强，新军甚至只认大师不认清廷。

掌握着新军，袁世凯成了晚清最有实力的人，也最终成了清王朝的掘墓人。只听命于袁世凯的各支新兵，也在袁世凯身后失去控制，直接导致了近代军阀割据局面的形成。

曾国藩和他创建的湘军，就这样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近代中国。这种影响是客观的、渐进的，也遵循着历史的规律，却也充满了无奈与遗憾。

文史杂谈